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苏光文,胡国强主编.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621-1491-8
I. 2… II. ①苏…②胡… III. 文学史—中国—20 世纪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4504 号

责任编辑:李 玲 钟小族
封面设计:白 好
版式设计:白 好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下)

ERSHI SHIJI ZHONGGUO WENXUE FAZHANSHI

苏光文 胡国强 主编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网址 www.xscbs.com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邮编 400715

电话 023—68254353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7

字 数:544 千字

版 次:2008 年 7 月 第 2 版

印 次:2008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21-1491-8

全套(上、下册)定价:78.00 元

下 卷

第四编 文学的意识形态中心化(1949~1976) 1

第一章 文学的意识形态中心化 3

第一节 文学政治功利性的强化 3

第二节 创作概述 12

第二章 小说 18

第一节 孙犁·杜鹏程·梁斌 20

第二节 赵树理·柳青·周而复 26

第三节 马烽·李準·茹志鹃 33

第四节 杨沫·欧阳山·峻青 39

第三章 诗歌 47

第一节 郭小川·贺敬之 49

第二节 闻捷·李瑛 54

第三节 毛泽东等的旧体诗词 59

第四章 戏剧电影文学 78

第一节 老舍·田汉 80

第二节 于敏·梁信 84

第五章 散文 90

第一节 杨朔·刘白羽 92

第二节 秦牧·吴伯箫 97

第五编 文学发展的多元态势(1976~2000) 103

第一章 文学发展的多元态势 105

第一节 文学新思潮的涌现 105

第二节 文学主体性讨论 111

第三节 文学本体讨论 117

第四节 文学批评模式的多种建构 122

第五节 创作概述 127

第六节 台港澳文学创作概述 137

第二章 小说	148
第一节 王蒙·张贤亮·谌容	150
第二节 贾平凹·陆文夫·高晓声	160
第三节 刘心武·张洁·路遥·莫言	166
第四节 张承志·王安忆·梁晓声·铁凝	176
第五节 白先勇·李昂	186
第六节 刘绍棠·周克芹·古华·韩少功	190
第七节 汪曾祺·邓友梅·冯骥才·张炜	198
第八节 “先锋派”·“新写实”作家群	206
第九节 “后先锋派”·“网络文学”作家	216
第三章 武侠小说	227
第一节 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	228
第二节 金庸	236
第三节 梁羽生·古龙·温瑞安·黄易	246
第四章 诗歌	255
第一节 归来的诗人群	257
第二节 “朦胧”诗人	263
第三节 “第三代”诗人	268
第四节 纪弦·余光中	273
第五章 戏剧影视文学	280
第一节 崔德志·苏叔阳	282
第二节 沙叶新·高行健	287
第三节 叶楠·王兴东·王浙滨	291
第四节 黄允·李宏林	298
第六章 散文	304
第一节 巴金·杨绛	306
第二节 柏杨·三毛	310
第三节 徐迟·贾鲁生	314
第四节 传记文学	318
第七章 少数民族文学	325
第一节 小说	328
第二节 诗歌	339
结束语	345
大事记	351

本书第一版执笔人名单及分工情况	416
本书第一版执笔人名单及所在学校情况	419
第一版后记	421
第二版后记	423

目 录

第六章 散文

从1976年至今,散文的宏观态势是由单线向辐射性的多方位拓展,呈现出斑驳陆离、令人目不暇接的发展格局。

新时期之初,在特定的背景下,“挽悼”散文盛行一时。“挽悼”散文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由于冤假错案的逐渐平反昭雪,人们痛定思痛,悼亡灵,抒哀思,“挽悼”散文自然应运而生。“挽悼”散文的题材,大致分为两类:悼念、歌颂人民领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悼念受冤屈而死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第一类散文写出了人民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和怀念,表现他们平凡而伟大的人格。何为的《临江楼记》、毛岸青与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刘白羽的《巍巍太行山》、巴金的《最后的时刻》、袁鹰的《飞》、杜宣的《刻骨铭心的教诲》、郁茹的《登临》、张长的《泼水节的怀念》等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人民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怀念。陶斯亮的散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作为这类散文中之突出者,在人们心中引起了巨大震撼。陶斯亮作为陶铸的女儿,以淋漓的笔法和血淋淋的事实,揭开了林彪、“四人帮”残害陶铸的铁幕,同时也展示了陶铸的铮铮铁骨。继后,薛明的《向党和人民报告》,诉说了贺龙遭受的冤难。《在彭总身边》和《黄桥烧饼》等散文,是对彭德怀和陈毅的深情怀念。第二类散文数量颇多。丁宁的《幽燕诗魂》,是悼念著名散文家杨朔的;黄宗英的《星》,是悼念被迫害致死的上官云珠的;金山的《莫将血恨付秋风》,是一封呼天抢地的控诉书,揭露江青勾结叶群残害戏剧艺术家孙维世的罪行;巴金的《怀念萧珊》也是一篇令人回肠荡气、哀怨凄楚的悼亡之作。还有陈荒煤的《忆何其芳》、楼适夷的《痛悼傅雷》、柯岩的《哭李季》等等,都是这一类型的散文。总的来说,这批挽悼散文情深意切,境界高远。它们触及到我国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促使人们在思考中探索这场历史悲剧根源,从而使思想受到启迪。同时,这批散文以酣畅笔墨渲染了各种人间感情,为散文表现艺术开拓了新意境。

20世纪80年代开始,散文的发展格局起了新变化。以巴金为代表的作家们以披肝沥胆的真诚和深邃痛切的思考,对“文革”悲剧进行反思,把散文创作从单纯控诉和声讨热潮中引向对自我个体及社会文化生态的反思和审察,拓宽和掘深了新时期散文



的思想内容,为本时期散文谱下了一首瑰丽激越的乐章。巴金心血凝成的五卷本《随想录》,以其“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的巨大真实力量震撼了文坛。杨绛《干校六记》和《将饮茶》,写了“干校”劳动和生活情景,不动声色地写出对现实的抗争和对人生的解剖。萧乾《北京城杂忆》、袁鹰《秋水》、新风霞《以苦为乐》等散文,以及赵丽宏《死亡余响》、苏叶《总是难忘》、宗璞《霞落燕园》等中青年作家的散文,都站在时代的高度上,对历史进行思考和总结,以启示今天和明天。

80年代文坛百花争艳的绚烂局面,促进散文进一步突破了“回顾”与“反思”的格局,呈现多元发展态势。努力追赶和反映新生活,挖掘新时代人们的意识观念和精神面貌的散文作品陆续问世,如王蒙的《桔黄色的梦》、杨羽仪的《水乡茶居》、贾平凹的《爱的踪迹》与《心恋》、赵丽宏的《诗魂》、和谷的《无忧树》、薛尔康的《留恋果》等等。敢于以深沉的忧患意识直面种种现实问题的佳作陆续推出,如苏叶的《能不忆江南——常熟印象》、王英琦的《河,就是海?》、张辛欣的《回老家》、阎豫昌的《深山杜鹃红》等等。一些中青年女作家,在表现自我真情的袒露上,显示出令人感叹的胆量和勇气。王英琦散文集《漫漫旅途上的独行客》是对以往的散文外感式抒情的突破;曹明华《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被誉为“文坛罕见的散文”;李佩芝和梅洁的散文也表现了作家惊人的主体人格力量。游记散文和新型的记人散文,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汪曾祺的《天山行色》、苏叶的《索溪的月亮》、叶梦的《羞女山》,以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作品、何为的《北海道之旅》、冯亦代的《漫步纽约》、王蒙的《访苏心潮》与《旅美花絮》、冯骥才的《雾里看伦敦》、杨绛的《回忆我的姑妈》、刘海粟的《回忆康南海先生》、刘亚洲的《恩来》等等。

本时期的散文在艺术上首先恢复了散文在历史长河中固有的多姿多彩。思维空间得到了拓展,新的开放式散文结构得以建立,尤其是一批“四不像”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同时,还大胆借用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法,如采用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抒写感觉与情感,由此把散文从单纯和狭窄的空间解放了出来。

80年代至90年代,散文创作出现了大的突破和变革。一是变革方向逆向化。散文变革是在文艺界缺乏思想和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到来的,散文热是由读者、市场先表现出来,再向文学的中心推进,出现社会心理影响市场,市场调节出版,出版促进创作的局面。二是在这场变革中,散文思维和观念得到进一步创新,突出表现为大众意识、现实意识、思辨意识成为散文创作的内容,散文走向普通人们生活,走向现代人们心理,走向人生的纵深思考地带,对风雅、空灵、轻浅反拨,对旧模式进行了否定。这一切都反映了蕴含在社会发展、时代变革、审美观念演替过程中的客观要求。

第一节 巴金·杨绛

巴金在新时期文坛的地位主要是由散文确定的,其重要作品就是五卷本《随想录》。

1977~1986年,巴金写成了四十二万字左右的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这部作品,是作者对中国文坛的新奉献。这部作品是对刚刚过去的那场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的反思与总结。作者在作品中多次谈到,自己所从事的写作,和在作品中抒发的爱和恨都是“为了希望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

五卷《随想录》,主要包括以下两层内涵:

其一,突出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自审意识。作家和众多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经历了一条十分耐人寻味的畸形的心理历程。悲剧过后,作品带着满身伤痕站起来,首先就“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文革”)发生的事情”^①。作家将自己推上灵魂的审判台,拷问和反观自己性格中乃至灵魂中的弱点:过于听话,过于天真,过于软弱,贪恋生命以至苟活的地步。在《十年一梦》中,作家精辟剖析自己的“奴在心者”。说自己“信神最虔诚的时期中,我学会了编造假话辱骂自己,自己羞辱自己,自己践踏自己。”当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时,他也高举右手响应。“文革”刚刚发动时,他就随着郭沫若公开表示自己的著作应当全部烧毁,在学习会上承认自己“写的全是毒草”。在“造反派”的大棒下“默默忍受毫不申辩”,成了“逆来顺受的软弱臣民”。作家对此回顾并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与评估,自然体现出作家的大智大勇和浩然正气,同时,也为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陷入灾难找到了原因:民族人格尤其是作为大众精英与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委顿、贫弱,以及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身上突出的理性意识和怀疑精神的失落,使我们的社会在混沌中倒退,无疑这是一场民族悲剧。因此,巴金在《随想录》中将自己比作“箭垛”,表达自己“煎熬”中的忏悔,是对民族振兴的一大贡献,是对美好未来的呼唤。集子中《小狗包弟》一文,看似在写一条狗的遭遇,实则是作家对往事的忏悔,对自身的责备,对那个时代的批判,是从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心中流

^① 巴金:《真话集》。



淌出来的诗篇。作家写道：“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剖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作家这样自责，不单是出于自己灵魂得到安宁，而是意在引起对疗救民族“劣根性”的注意！

其二，《随想录》蕴藏着对全人类的爱。巴金总是把一时一地一个民族的历史悲剧，用人类意识去观照与思考，这反映出他具有的博大胸怀和卓识远见。“文革”对中国人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巴金没有把这场灾难仅仅看做一国之不幸，而认为是“人类历史上另一大悲剧”，是“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表示，要“向别国人民交代”，“要子孙后代永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巴金从事创作之初衷就是“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到了晚年创作《随想录》时，也一再表明其创作目的在于“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因此，《随想录》中渗透着坚实内涵的人类意识。在《我和文学》一文中，他说：“我对一位日本朋友说：我们遭逢了不幸，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我们也算是一个反面教员吧。”这种伟大的爱心留给后世的将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警示人类在未来的道路上不再重演类似的历史悲剧。一部《随想录》，绝非仅仅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它是巴金半个多世纪历练人生的精华。

新时期巴金散文的艺术风格达到了随兴之所至、顺势行文而能涉笔成趣的境界。文学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是“返璞归真”。巴金的散文就达到了这种“无技巧”的境界。具体表现于以下几方面。其一，是真情的流露。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我还要争取写到八十……我要把我的真实的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巴金在拼着自己最后的余光写下文字留给读者，其真情、真言与真心最为宝贵。其二，对各种散文笔法的娴熟运用。《随想录》中，虽然没有将意识流、蒙太奇、象征等手法引入，但对叙述、议论的绵密自然乃至白描、巧妙构思、启承转合、首尾照应等散文“常用技巧”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回忆萧珊的几篇作品，把夫妇俩真诚情感以及萧珊对他的关照，可谓写得入木三分。《小狗包弟》一文，把小狗包弟逗人喜爱的动态写得活灵活现。至于在《二十年前》一类的文章中，更生动地描绘了自己那副胆战心惊、惊恐不安、手足无措的模样与心理状态。这些都表明作家的功夫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巴金新时期的散文作品，包括他八万多字的《创作回忆录》，既是散文发展史上的



一座丰碑,更是他奉献给人类的智慧。

杨绛(1911~),祖籍江苏无锡,出生于北京。

杨绛从乡土和血缘中吸取了灵气,而又深得博大深厚的北国文化的滋养。因此,她在经历了十年劫难后,仍以其特殊的才情,为新时期散文文苑献上了一朵朵鲜花。

杨绛散文的内容中最为突出的是对旧日人生的追忆,在追忆中展示出一个丰富的古色古香的世界。她的作品《回忆父亲》、《回忆姑母》和《论钱钟书和〈围城〉》及《忆傅雷》等散文,描绘出了古中国书香门楣浓厚馥郁的文化氛围。《忆父亲》一文就这样写道:“我在高中时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写父亲这种传播智慧之果的方式,令人不禁随作家一起回到了旧日温馨的家庭之中。作家还以其灵巧的笔触,描绘出对情感世界深刻的领悟和知之稔熟。在《论钱钟书和〈围城〉》一文中,描写钱氏兄弟童年时戏刺女裁缝乖巧的女儿宝宝的细节,并议论道:“兄弟俩觉得这番胜利当立碑纪念,就在隔扇上刻了‘刺宝宝处’四个字……这大概是顽童刚开始‘知慕少艾’的典型表现。”这表现了作家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此文还写有:“许君上课时注意一女同学,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作家还将他们夫妇俩在牛津读书时的一段轶事写进了本文:有一次,钱钟书趁杨绛午睡未醒之际,在她脸上画了一个大花脸,“他没想到我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在同时期散文中,像杨绛这样带着微笑凝练地道出夫妇两心相契的确实很少。同样,过去时光中黯淡的日子也被杨绛摄入作品。40年代处于沦陷区上海的日子是最难熬的了。钱钟书曾回忆过:那时的生活主要是靠杨绛的剧本上演所得而维持。但作家写这段时光仍带着平淡和气的语调。作“灶下婢”的她,“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杨绛描写过去岁月的这些散文,显示了她修养的高深和对人生洞察的透彻。

杨绛以独特的视角描写“文革”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残害。《干校六记》是这一类散文的代表。这本散文集的六篇散文《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叙述了动乱年月“干校生活”即衣食住行劳以及内心的感情活动。《“小趋”记情》中,写一只通人性的小狗“小趋”与“我”关系融洽,“‘小趋’来作客,我得招待它吃饭”,“我得把饭碗一手高高擎起,舀一匙饭和菜倒在自己嘴里,再舀



一匙倒在纸上,用另一手送与‘小趋’,不然它就不客气要来舔我的碗匙了”。情趣斐然的叙述,反映了作者处于逆境中仍不失热爱生命的真诚。在反映“文革”生活的作品中,作家还以隐迂曲折的方式向读者传递了大儒及知识分子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独特方式,这确实是混乱年代既不伤害他人又保护自己的智者妙方。《丙午丁未年纪事》一文中写道:“秋凉以后,革命群众把我同组的‘牛鬼蛇神’和两位领导安顿在楼上东侧一间大屋里。屋子有两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曝晒,窗帘已陈旧破败。我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打算撤下帘子,让屋子更轩亮些……出于‘共济’的精神,我还是大胆献计说:‘别撤帘子’。他们问‘为什么?’我说:‘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作准备。’他们观察实验了一番,证明我说的果然不错。那两个大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有撤下来。”这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仍存一股反抗的力量。这还是“春风吹就能再生的理想不灭的原因”。

杨绛散文突出的艺术特征是反讽艺术的使用。《冒险记幸》一文之中,作家写她自己在大雪天,冒着风险去看望在另一处接受改造的夫君,于暗夜中踏雪而归,而归途上“有一眼沤肥的粪井,井很深”。“不久前,也是看电影回去,我们连里一位高个儿年轻人失足落井。他爬了出来,不顾寒冷,在‘水房’——我们的盥洗室——冲洗了好半天才悄悄回屋,没闹得尽人皆知。我如落井,谅必一沉到底,呼号也没有救应。冷水冲洗之厄压根儿可不必考虑。”这里的“不必考虑”,则深含一种彻骨的恐惧,这是那个灾难年代毫无自卫力的知识分子的必然心态。《丙午丁未年纪事》一文中,作家描写“文革”初期经历的游街窘境时,竟用了这样的笔法:“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虽然没人照相摄人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明明是极为难堪的场面,而作家却选择了一种谐谑性的叙述方式,在这种超然的叙述态度的背后,是以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生宇宙的透彻领悟和忍辱精进以及顽强得近乎荒诞的精神力量为后盾的。

总之,杨绛的散文,叙述的似乎都是一些生活琐事,但从中却展示了人生的沧桑感、变迁感以及许多生活哲理,读后令人掩卷深思。

第二节 柏杨·三毛

柏杨(1920~2008),原名郭衣洞,出生于河南开封。

柏杨三十多年来,写作不辍,著作浩繁。他是台湾第一个因写杂文而声名大噪的作家,在海内外拥有众多的读者。

柏杨自60年代起,开始杂文创作。他以犀利的笔触,议论时事、抨击时弊。他首创“酱缸”学说,对于国人历经几千年而相沿不衰的因循苟且、勇于内斗的气质发酵、整个文化中的那种倾轧的习惯,无不予以辛辣讽刺,尤其是他的《丑陋的中国人》^①。柏杨通过对我国旧文化遗毒的观察和思考,探讨和批评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国民性”的阴暗面,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来,还不能使中国脱离苦难(贫穷落后)?”他揭示其外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因是封建传统的束缚,并着重从内因方面作了一些不无鉴戒意义的研讨。柏杨主要针对台湾现实有感而发,但其中许多独具慧眼的深刻见解,同样引起大陆读者共鸣。他那丰富的阅历、深刻的思想、犀利的笔锋及批判的勇气,令人拍案叫绝。

柏杨杂文具有独到的艺术风格。他感情强烈,不平则鸣;文笔恣纵,挥洒自如;幽默风趣,大胆泼辣。像鲁迅的杂文那样,柏杨手中的笔也是一把锋利的刀。“书生报国无它物,唯有手中笔如刀。”故乡多柏树,也多杨树,柏树冰雪长寿,有鳞鳞的叶子、龟裂深褐的灰色;杨树笔直通天,风来时哗哗作响,动人心魄。这是他笔名的由来,也是他性格的写照。曲折的人生经历,使柏杨洞悉众生百态,而内心又保持天真与豪放。外表嬉笑怒骂的他,实则愤世嫉俗。《谈人生》、《谈社会》、《谈女人》等杂文正是积淀于胸中的正气、怒气、激荡之气和郁闷之气在心灵与现实的碰撞中全然的释放,毫无顾忌,痛快淋漓。“他向一切看不惯的东西挑战,中国人社会里种种可笑、可气、可怕的真理与中华民族蕴藏着的巨大的创造可能性中间的悲剧性矛盾,在许多方面都被他的笔尖触及。”^②读柏杨的杂文,无论大学教授、村民商贩、家庭主妇还是年轻学生,都有心领神会的微笑,也还有冷不防正中痛处的惶惶然。《女人的名字:强哉骄》、《文人无行乎?

^① 发表于美国中文杂志《台湾与世界》和台湾《自立晚报》副刊,是柏杨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依阿华大学的长篇演讲。

^② 里程:《十年铁窗三部书——台湾作家柏杨印象记》,《台湾文学选刊》1985年第4期。



文人相轻哉》、《发思洋之幽情》、《恶补三大病源》等杂文,无一不是在向市侩习气以及庸俗的小市民生活进行猛烈攻击。冷嘲热讽的杂文中,我们感觉得到一个富于民族正义感,对故土、家园、朋友有着深厚的爱的“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在跳动。

柏杨的文章既流利又幽默,经常会有一些精练深刻、发人深思的语句,譬如广为人知的一段: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①

柏杨杂文的语言,清淡时如淡云微月,浓重时又似狂风急雨,而最令人惊服的是他的率真与大胆。柏杨常常采用新鲜形象的比喻、机智灵动的反语和夸张,熔“谈话风”和诙谐美于一炉,像《鸭子嘴》、《酱缸特产》、《恐龙型人物》、《尿入骨髓》等等,都是把深重的感慨痛彻心扉地和盘托出,对中国数千年旧思想的垃圾积淀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扫荡。

柏杨的杂文观察独到、剖析透彻,行文汪洋恣肆,不避权贵、不畏众议,极尽辛辣尖锐,易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但也难免为人所不乐闻。他的文中确有不少偏激之辞,但温文尔雅、无病呻吟、歌功颂德本来就不是柏杨的风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己何尝不知道‘闷’为上策,但想说的话还是止不住往外冒”。作为一个有勇气讲真话的作家,从“美的东西首先是真的”这一美学观点来说,柏杨是有着许多过人之处的。

三毛(1943~1991),原名陈平,祖籍浙江,出生于重庆。

三毛及其作品,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和生命的独特视角。从60年代初发表作品起,到80年代中期的二十多年间,三毛显示出惊人的创作能力,她先后出版了《撒哈拉的故事》等近二十部作品集。这些作品,打上了她富有传奇色彩经历的烙印,事实上是她自身生命的全面抒写。流浪和写作合而为一地体现着三毛全部人生价值,这二者是如此不可分割,从而使她的作品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三毛的作品是灵魂漫游的足迹,充满了深切的人间真意和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不管是早期“雨季”的忧郁

^①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感伤、中期漂泊的奇异际遇,还是后期回归的深沉平和,都无一例外地表达着同样的主题,即对至高的真、至全的善与无限的美的执著追寻。作为一名得到广泛接受的作家,三毛及其作品的存在,超出了通俗和流行的意义:她的作品,不是对狭隘自我悲欢的记叙,而是站在普泛的高度,对美好善良人性的诚挚呼唤。三毛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行文中体现出传统文化和诗学对她的极大影响,儒家仁礼观念深植于她的内心,其间又混合着禅与道的超然,作品显得时而含蓄温婉,时而热烈活泼。其朴素纯净的语言、轻松洒脱的写作风格和明朗而略带郁郁的格调,牵动了千万读者的心。

从迷上文学伊始,三毛就力图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写作个性。生性敏感忧郁的三毛,早年由于受到过多的精神创伤,急于用笔倾诉。试笔之作《惑》,记录下青春时代的迷乱和孤独。那类似“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反复追问,将这种千丝万缕的心绪扩展到无以复加的境地,其中还渗透着神秘荒诞的生与死的思考。《雨季不再来》集,收入了这一时期的作品,它“代表了一个少女成长的过程和感受,它也许在技巧上不成熟,在思想上流于迷惘和伤感,但它的确是一个过去的我”^①。这些在孤寂愁苦的年少心态中产生的作品,展示了一颗不安灵魂的纷乱与焦灼,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昭示了某种观察思考社会人生的方式,这是一种纯然审美的人生态度,它在自我精神的探求中远离了尘世的烟尘。《雨季不再来》的伤感并非一己的伤感,而带有“成长过程”的普遍情绪;它不仅描写人生图景,还要探寻人生要义,这一命意奠定了三毛全部作品的基调。《雨季不再来》之后,三毛从渴求外界的赐福到对痛苦不幸的达观,从稚嫩的追问到以生命作答,完成了一次次超越。

精神流浪的意向,始终支配着三毛。空旷辽远的撒哈拉沙漠于她似乎是一块坚实的立足之地,同时是她观照生命、继续进行心灵探索的支点。三毛的大量作品,写成于她出国留学和在沙漠寄居的这段时间。也许是“撒哈拉”这一刻骨铭心而无法解开的情结,也许是自我放逐后的身心自由,三毛感到拥有了真正的人生。《倾城》作为留学生涯的代表作品,它捕捉到刹那间闪过的一抹灵光,隐隐透出某种对不可企及之美的慨叹;《西风不识相》中倔强勇猛的三毛,让人惊讶她是否就是那个曾在“雨季”中孤苦奔跑的忧郁女孩。寄居撒哈拉沙漠后,三毛以《白手起家》展开了拥有人间挚情和欢爱的精神旅程,从此流浪以“家”的方式进行,并编织起一个个海市蜃楼般的梦幻。在沙漠上安家,这本身就折射着人类悲怨的浓重投影。这里的“家”恰如茫茫大漠的一小圈绿洲,两人空间的宁静抗衡着外面世界的喧嚣,这种抗衡意味着与命运和生存的苦痛

^① 三毛:《当三毛还是在二毛的时候》,《雨季不再来·自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作搏斗。三毛这一时期的作品,精致的结构、空灵的文字间弥漫着氤氲之雾,尽管经受了大漠风沙的沐浴,飘逸中仍未褪去淡淡的忧伤。在撒哈拉这片“没有花朵的荒原”上,不仅仅由于对异族文化的爱,也不仅仅是追求奇特诡谲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使得三毛对这片荒漠的芸芸众生倾注了巨大的同情和关切。与其说三毛感兴趣的是大漠居民“走路的姿势,吃饭样子,衣服色彩式样”等等,不如说她更注重发掘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如宗教信仰)。《悬壶济世》囊括了一切表达慈悲的可能方式,诙谐的笔调显示出豁达的襟怀。《爱的寻求》揭示蒙昧状态下人所承受的悲苦与哀戚。《一个陌生人的死》、《哑奴》中生存惨状和人性窒息的展示与博大爱心的虔诚表达形成强烈对比。但善与美是不可磨灭的。《巨人》写了具有刚强韧性品质的少年形象,他像一个伟岸的巨人屹立在天地之间;《这样的一生》里一群老人平凡而充实的生命轨迹留给人们不尽的启迪。

离开撒哈拉是三毛生活的一次转折。一件重大变故(丈夫荷西猝然去世)改变了三毛的生活道路与创作方向。她的作品不断出现苍凉的死亡主题。她沉湎于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之中。荷西作为得而复失美丽人生的幻影,在三毛笔下得到反复吟咏。《梦里花落知多少》、《背影》等集在这种追忆和吟咏中,在更高层次上回到忧郁“雨季”的命意:对生之奥秘的追问。这一再度追问消除了年少的迷惘,而带着心智成熟后的理性,却又增添了一丝无可名状的宿命色彩,仿佛每一次欢乐背后隐藏着悲哀,短暂的幸福酝酿着巨大的悲剧。她在中南美之行后写下的游记集《万水千山走遍》里,仍未摆脱这层阴影的笼罩,异域风情在她心里引起的不再是惊异,而陡生几分沉郁。

三毛没有创作出震撼整整一个时代的宏篇巨制,但是她的作品中真诚的悲悯情怀却令人难以忘却。可以说,三毛用以支撑她生命和作品大厦的正是这种悲悯情怀,或广泛仁爱,爱既是她生命追求的制高点,又是其作品拥有活力的核心。这颗自卑又高傲、寂寞又热烈的灵魂,使人们在她那充满艰辛与坚韧的心程中看到了生命本身的绚烂多彩。她“用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感受甜蜜或是悲凄,“她都无意矫饰”^①。她的作品是一曲曲天籁之声。

^① 司马中原:《仰望一朵云》,《温柔的夜》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第三节 徐迟·贾鲁生

徐迟(1914~1996),浙江吴兴人。

徐迟的创作涉及小说、诗歌、散文等诸方面,但给他带来盛名的却是报告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他以独特的风格和成就确立了在报告文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徐迟报告文学的主要特点是集中表现知识分子,讴歌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精神。他突破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常见的那种“事迹介绍式”的呆板写法,在纵向介绍人物经历的过程中,放手写人物的精神、品格、气质。从此,知识分子的形象辉煌地出现在中国文学人物的画廊上。

他的作品中,老一辈科学家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跨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代。《地质之光》中的李四光,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在国际地质学界异军突起,在落后的旧中国开始创建先进的地质力学。他把学术研究和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几十年中,他走遍祖国的峰峦峡谷,但始终守口如瓶,绝口不提中国的矿产分布。直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才尽情呈现胸中的宝藏,透露了新华夏海沉降带的秘密,终于使石油从中国大地喷薄而出,粉碎了所谓“中国贫油”的谬论。作品除了介绍李四光地质力学方面所取得的震惊世界的成就外,着重描写他追求光明、热爱祖国的精神世界。他拒绝参加蒋介石的接风宴,不接受国民党给他的地质研究所所长的职位,蔑视国民党外交部要他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密令,巧妙地转道瑞士回国。作者以浓墨重彩生动地再现了爱国科学家的人格力量。新中国热烈欢迎他的归来,周恩来总理登门共商科技发展大计,给李四光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充分条件。他不负众望,用自己的学识、智慧,为祖国描绘出石油、煤炭、金属、非金属、稀有金属及分散元素等矿产资源的壮丽远景,以自己事业的大发展印证了他早年充满爱国主义感情的预言:“我们的结论是:随着地球旋转加快,亚洲站住了,东非、西欧破裂了,美洲落伍了。”

《祁连山下》中的画家常书鸿,《生命之树常绿》里的蔡希陶,还有《在湍流的漩涡中》的周培源,都是献身科学事业的爱国知识分子,展现他们或抛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或安身于茫茫原始森林,描述他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为新中国科技发展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



5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科学家陈景润,是作家塑造得最动人的形象。《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的生活道路十分曲折甚至有些传奇色彩。他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考验、磨难,社会上的斗争,个人的经历,对他的个性、心理的影响是非常深刻复杂的。他把全部心智和理性都献给科学事业,这是陈景润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他仿佛生活在数学王国里。在生活上他一无所求,穿着“通风透气”的鞋,啃几口干馍就过一顿。他在病得心力已到衰竭的地步还挣扎着起来,坚持工作。他对善意的误会,无知的嘲讽,恶毒的诽谤,不屑一顾。他在仅六平方米斗室里创立了震动世界数学界的陈氏定理。陈景润在这种极端困苦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不挠的人格力量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正是作家所着意刻画的。

徐迟不但反映优秀科学家人格和精神上的共性,还写出了他们独具的个性。陈景润“丑小鸭”的自卑感,异乎寻常的克己,独处的孤僻,以及“谢谢”、“我很高兴”这些谦恭诚恳但却单调贫乏的口头语,都是他的个性及表达方式。李四光、周培源、常书鸿的个性也写得很成功。常书鸿在与叶兰相处的笨拙、迟钝与他对艺术事业的敏锐、执著,这种矛盾统一构成他鲜明的个性。李四光还有着一些诗人气质,周培源还有教育家的特点,等等。这些个性特征,都体现了独特的“这一个”。

徐迟是位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帮助他在报告文学表现方法上带有较强的诗人气质和特色。

首先,徐迟的诗人气质使其报告文学含着诗的激情。科学王国本属于理性王国,可徐迟写来,构成胰岛素的五十一个氨基酸竟“像娇嫩的芭蕾舞演员似的穿上红菱鞋,披着柔软的头纱,戴着彩色的长套,施舞而来,单人舞,二人舞,四人舞,组舞和多人舞,舞形婆娑,跳出了各种高难度的翩跹舞姿。先是那三十个舞蹈家,合成了长链,后是那二十个舞蹈家和前者跳起了长链舞,最后他们是旋转、扭曲、叠合,合成了一个罕见的美妙的舞蹈夔纹,交响乐队奏鸣着,为他们合奏着无标题组曲”(《结晶》)。这一段描写,把抽象的理性世界用具体的形象展现出来。作家还注重激情和理智的统一。在《生命之树常绿》里,杜鹃一段是写实,写杜鹃形态、特点、性格。作者以诗人的眼光撷取美的光色,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色彩缤纷、充满诗意的画,并以花的品格暗示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的品格,从中悟出人生的哲理。

其次,徐迟追求诗意和叙述的结合。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体裁,应该向读者提供具体的信息,所以叙述是必不可少的。徐迟能把知识、事件的介绍和诗的意蕴很好地结合起来。上文引述的《结晶》片断,就是在介绍胰岛素的性质、功用、人工合成的过程及巨大意义之后,生发的情意盎然的叙述文字,而且以氨基酸的旋转与结晶,

象征科学家们和谐默契的集体拼搏。徐迟介绍必要的科学知识但省略了专业化的求证过程,侧重从直观印象和感受,用文学语言加以描述,使之汇入整体的艺术构思中。因此,徐迟笔下的“植物学”、“纯数学”、“物理学”都开放着灿烂的花朵,真正成了“抽象思维的牡丹”。就这种把抽象科学王国描述得如此美丽的能力而言,在报告文学领域中,徐迟是首屈一指的。

第三,在语言风格方面,更显出作家的诗人气质和长处。作家善于张开艺术的触角,在普遍的现象中孕育和捕捉诗情,化为具体的形象和意象,语言带着强烈的抒情意味,显得华丽典雅,汪洋恣肆。“他跋涉在数学崎岖的山路上,吃力地迈动脚步,在抽象思维的高原,他向陡峭的蝗岩升登,降下又升登!”(《哥德巴赫猜想》)以此状物叙事,浮想联翩,意象生动。作家的诗意就包含在这种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中。徐迟还善于从生活中和从古代与外国文学作品中吸取生动的词汇、活泼的句式,或四字排比,或前后对仗,或骈散结合,或长短搭配,造成一种随表现对象的特点而变化的节奏感,包含充沛气势的语调。作家正是这样引导读者分享科学家攀登和成功的喜悦,打破了科学家与读者之间的屏障。

贾鲁生被称为“新生代”作家群中的怪杰。他以特有的勇敢和冒险精神,“混”入丐帮,闯台湾海峡,进西部监狱,由此写出《古老的东方有条龙》、《丐帮漂流记》、《西部在移民》、《性别悲剧》、《孔子与中国》等等作品。

贾鲁生的报告文学的显著特点,首先表现为对社会热点的关注。他感觉敏感。他最早最自觉地把他的创作与商品经济联系起来。他对席卷而来的商品大潮抱肯定态度。他在作品中,呼唤改革,呼唤自由,呼唤人道主义,同时对社会、对人类、对人性有一种永恒的思考。温州、胶东这两个地方,是当今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最快因而在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引起变化最多的两个敏感地带。早在1986年,当温州的暴富和个体经济成为许多作家描写对象时,贾鲁生从一张小报上看到了温州的“抗会事件”,便敏锐地嗅出在温州经济变革背后正在发生着的深刻社会闹剧。他紧盯着温州,从民间金融抗会的闹剧,一直写到令海内外瞩目的大规模造坟活动和纳妾现象。他通过造坟和纳妾这两个社会现象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农民富裕起来之后,却大办婚丧事、买地、盖房、修坟、娶小老婆,追求地主式的生活方式,使商品经济呈现封建化的蜕变。经济变革非但没有带来人们观念的变化,反而出现无道德无文化的畸形。

贾鲁生观察这个时代的角度很独特。他写社会异态,写社会死角里新奇古怪、鲜为人知又有现实意义的人和事,如乞丐、犯人、打狗运动、太平间、海上贸易、书贩子等。